

看文化

艺文 从谈

《马拉喀什条约》

点亮心灵之光

本报记者 谢颖

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生效,中国成为条约的第85个缔约方。

《马拉喀什条约》于2013年6月27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通过,由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该条约要求各缔约方规定版权限制与例外,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被称为世界上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2013年6月28日,中国签署了《马拉喀什条约》,成为首批签署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阎晓宏曾经历了《马拉喀什条约》的酝酿与起草过程,也曾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上参与对其的讨论。如今,他期待着《马拉喀什条约》生效后,为我国视障人群获得文化权利带来福音。阎晓宏告诉记者,作为《马拉喀什条约》最早的签署方之一,我国对条约的缔结和生效做了大量工作,这其中,国家版权局、中国残联等机构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版权领域,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保障视力残疾人等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1991年6月1日施行的著作权法规定,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2020年11月11日,著作权法完成第三次修改,并于2021年6月1日施行,其中将合理使用情形由原来的“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扩展到“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体现了《马拉喀什条约》的核心内容。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马拉喀什条约》。2022年2月5日,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交存了《马拉喀什条约》批准书。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是一种合理使用。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视障人群的阅读方式和需求也发生变化,不仅有过去的盲文书籍,还出现了有声读物、电影、VR等新的形式。但这些新形式,对视障人群也存在版权障碍,所以总体而言,他们阅读空间所受的限制反而增多了。”阎晓宏表示,通过著作权法修订和《马拉喀什条约》落地,视障人群的阅读资源将更加丰富,不过值得注意的,“无障碍方式”仍然有一定的限制,即其制作和提供的对象是阅读障碍者,不能扩大范围,这种合理使用不影响同一作品其他版本的发行和销售,不损害著作权人正当的经济利益。应做好宣传,让人们准确理解《马拉喀什条约》的内容。

2021年,民进中央曾提出“关于尽快批准加入《马拉喀什条约》,充分保障视力障碍者文化权益的提案”,此后不久,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副主任林阳到中国残联参加盲人阅读权益访谈·倾听活动。在与盲人朋友交流中,林阳了解到视障群体数量很多,而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们对阅读的渴求,“有一位在盲人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她说盲人朋友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和阅读需求非常强烈,但可供其阅读的盲文书籍数量有限,而且出版时间也很慢,令他们非常苦恼。”林阳说,阅读像阳光一般滋养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热爱阅读、渴望阅读,这种需求应当得到重视和满足。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而阅读障碍者的数量可能更多。《马拉喀什条约》的受益方不仅包括视力残疾人,还包括由于视觉缺陷、知觉障碍或身体残疾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能正常阅读的群体。林阳认为,《马拉喀什条约》的生效,一方面可以使他们阅读全世界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优秀作品为世界其他国家的阅读障碍者所了解和喜爱。

4月24日,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在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生效后,将极大丰富我国阅读障碍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其受教育程度,推动我国优秀作品海外传播,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版权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展现我国大力发展残疾人事业、充分尊重人权的良好形象。国家版权局将做好《马拉喀什条约》实施工作,进一步完善配套机制,制定切合中国实际的实施办法,加强对被授权者的指导和监管,规范作品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和提供,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加强合作,推动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把《马拉喀什条约》对阅读障碍者的支持落到实处。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孙宝林看来,《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生效体现了我国对阅读障碍者平等文化权益的保护,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贯彻和践行。应当积极促进《马拉喀什条约》的实施,为广大阅读障碍者提供丰富多彩、无障碍方式的产品。当前,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投入。“作为政协委员,更要履职尽责,持续建言献策,推动《马拉喀什条约》实施,让阅读障碍群体能够更好地学习知识、感受文化,让全民阅读更加深入人心。”孙宝林说。



背景介绍: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建设的“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上线试运行,其中包括阿炳《二泉映月》在内的大量珍贵音频文献和诸多濒危传统音乐形式共约7000小时的音响资料,受到业界专家学者关注。这批录音档案中,有不少堪称中国传统音乐的“绝唱”,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7000小时的音乐录音

阿炳的《二泉映月》、新疆老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1500多首黄土高原河曲民歌、1956年健在的全国86位古琴家演奏的270多首古琴曲……这是一份珍贵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几代学者、艺术家,历经半个多世纪考察、采集的音响资料,时长约7000小时。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记录着中华文化沃土上所孕育的音乐传统,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凝结的音乐思想,是文化发展之源、文化自信之源。”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韩子勇表示。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曹安和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家,深入民间,开始系统地对中国传统音乐开展实地考察和资料采集。那时,中国刚刚具备依靠现代科技手段获取音乐音响文献的基本条件,音乐研究所正是利用这一手段,有计划地打开了搜集、采集的工作局面。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音乐研究所学者的足迹遍及全国,采集了包括阿炳《二泉映月》在内的大量濒危传统音乐的珍贵资料。据曹安和回忆,当杨荫浏给阿炳录音后,阿炳第一次从“神奇”的铁盒子里听见自己二胡的声音,像孩子一样高兴地笑了。

“如果没有音乐研究所,不知道有多少像阿炳一样的民间艺人和多少首像《二泉映月》一样精彩的乐曲,在民间产生之后便随风消散了。正是由于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学者和艺术家的努力,才让这些今天被我们视为民族瑰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面世和流传。”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田青说。

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这份时长约7000小时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渐形成。“像这样倾举全国之力、大规模采集整理传统音乐音响资料的,在世界都少见,可以说几乎没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张振涛说。

199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率先出版。该书收录12类音乐音响,分别是:古代歌曲、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综合类传统乐种、宗教音乐、歌舞及舞蹈音乐、民族器乐曲、合奏曲、现代创作歌曲、西洋乐器演奏

今天,国人对于《世界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不再陌生,各地对于这两类名录的“申遗”怀有极大的热情。殊不知,《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与上述两类名录并列的三大人类遗产名录之一。能够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遗产价值,都是人类创造的珍贵文化财富。人们也许并不清楚,我国目前进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已有13项之多。而最早进入该名录的7000小时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无疑最具代表性。今天,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已不仅仅属于创造了它的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在纪念“世界记忆工程”启动30周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5周年之际,我们需要对该遗产的价值有新的认知。

在我看来,这批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能够被搜集起来、录制下来、保存下来,殊

一部丰厚珍贵的音乐档案

本报记者 郭海璞



门的团队,采用国际标准,对唱片(粗纹和密纹)、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等不同类型的模拟载体进行数字化抢救与保护。最终形成目前国内收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数量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珍贵度最高的专业数据库。

与其他形式的文化遗产不同,音响档案最核心的价值,除了外部的载体形式,更重要的是所记录的音响内容。对于抢救保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韩子勇指出,“音响档案既要保护管理好原始载体,又要科学准确地数字化提取,还原它所记录的声音内容。”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主持设计建设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开创性地借用数字技术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向社会发布,与世界共享。

《世界记忆名录》中的首个音响档案

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批珍贵的录音资料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记忆”项目,并被列入第一批《世界记忆名录》。这不仅是中国首个人选该名录的珍贵档案,也是世界上首个人选该名录的音响档案。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确保世界文献记忆得到更好的保护,发起“世界的记忆”,并于1997年宣布第一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项目。“世界的记忆”指的是记录世界人民集体记忆的文献遗产,它们在人类文化遗产中占较大比例,记录了人类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是当今和未来世界共同体的历史遗产。

“199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无意间将收集的音响资料情况,报告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方立即派来了专家——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博士。”张振涛介绍,舒勒博士对这批珍贵档案进行深入考察,确认这批历史音响“是不可复现的,具有重大历史、学术、文化价值的,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笔珍贵遗产,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外国专家的评价,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杨荫浏团队所做的工作,令见多识广的外国专家都感到惊奇!”张振涛补充说。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入选,“世界的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数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系统地田野录音的成果,涵盖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的,这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

在入选后的20多年里,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抢救保护工作:组织专

门团队,采用国际标准,对唱片(粗纹和密纹)、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等不同类型的模拟载体进行数字化抢救与保护。最终形成目前国内收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数量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珍贵度最高的专业数据库。

与其他形式的文化遗产不同,音响档案最核心的价值,除了外部的载体形式,更重要的是所记录的音响内容。对于抢救保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韩子勇指出,“音响档案既要保护管理好原始载体,又要科学准确地数字化提取,还原它所记录的声音内容。”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主持设计建设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开创性地借用数字技术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向社会发布,与世界共享。

让浓缩着祖先智慧的声音永远流传

登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进入“世界首个‘世界的记忆’录音档案项目”主题,根据分类可以浏览上线的录音资源。

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是1950年由杨荫浏、曹安和等人录音整理的阿炳的6首乐曲,《二泉映月》早已成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张名片。

新疆老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资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万桐书、刘炽等人在新疆抢救下来,为后人



值得倍加珍视的文化遗产

李心峰

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音乐遗产不同于文物类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没有某种固态的物质媒介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保存。它是过程性的、时间延续性的、一次性的,甚至是不可重复的,即生即灭、转瞬即逝的。在人类没有发明录音技术的情况下,声音、音响、活态的音乐,是根本无法保存的,甚至是无法原样记录的。像那些文字的描述、乐谱的记录,实际上距离活态的音乐本身,已经相去甚远。自从现代科学技术发明了录音技术,音乐的音响才得以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的音响档案、音乐记忆。然而,这种记录声音的录音技术,一开始比较简陋,其保真性与稳定性并不理想,其发展步伐也比较缓慢。但是,中国的音乐学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能够利用当时具有的录音设备、录制条件,自觉地、有针对性地去搜集、录制传统音乐资料,并且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极其难得的7000小时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这样的海量资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它的珍贵性实在是非同寻常。

这样一笔丰厚的传统音乐档案之所以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还有一个原因,即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具有深厚音乐素养的音乐学家们的直接参与或专业指导下进行的,著名音乐史家、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是杰出的代表。这保证了它的原真性、专业性、典型性和代表性;正因如此,得以保留了像阿炳《二泉映月》等六首二胡与琵琶曲子、新疆老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资料、20世纪50年代全国86位古琴家演奏的270多首古琴曲,等等。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经典与典范之作。不敢想象,假如没有这批音响资料保存下来的这些音乐记忆,我们将会失去多少宝贵的音乐财富!

7000小时的音响资料,其价值当然首先体现在音乐方面。它构成了音乐民族志、音乐史中的第一手资料与直接的研究对象,也为后人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甚至,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音乐乃至艺术领域,具有更为广阔广泛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比如它所必然蕴含着的民俗的、语

留下了可供学唱、传承的唯一珍贵文本。

1500多首河曲民歌,是1953年由晓星、简其华等人采集记录,埋藏于晋陕蒙交界黄土高原上的“河曲民歌”被世人所认识,并成为至今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资料。

270多首古琴曲,则是1956年由查阜西、许健、王迪等人访问全国86位古琴家、搜集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琴曲遗产。

“现代科技让这7000小时的‘世界的记忆’,浓缩着祖先智慧的声音能够永远流传,甚至不朽。”田青表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让更多人不仅能通过这些声音触摸祖先的靈魂,激发想象,获得灵感,甚至在此基础上创造今天的音乐和文化。

在这批音响档案中,有一部分是“曲艺音乐”,包含20多个曲种形式的400多个唱段。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曲艺理论家吴文科颇为关注。他感慨道,“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过去70多年里,形成了以‘前海学派’等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人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传统。他们把艺术研究与对历史、时代和社会、人生的关联探究结合起来,主动走向民间,把学问扎根在鲜活的文化土壤中,开拓了研究视野,也深化了研究层级。”吴文科介绍,正是在这种优良学术传统下,20世纪80年代末,以音乐研究所为核心,曲艺研究所也参与采集、摄制了一批珍贵文献资料。“采集资料、梳理文献、留存标本并使之与科技手段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成果;同时,它还还为学术研究提供非常鲜活的研究素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存续保留了大量的艺术基因。这不仅仅是‘前海学派’优良学术传统和学风的体现,也是中国人尊重历史、珍视文化、礼敬传统的体现,更是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刻体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保留延续中华文化血脉,让我们知道从哪里出发,知道用什么创新、创新什么,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吴文科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月宁也格外关注这份音乐录音档案。她说,这些来自民间的资料十分丰富且珍贵,也非常接地气,有一大部分还葆有原始音乐形态。从音乐学角度看,音乐录音不仅要有声音,还要有乐谱和文字,这就需要了解录音的详细信息,比如它采集的背景、采集的时间、人物、所使用的乐器等,以呈现出它的地图感,这样才能进行转化创新;同时,还要注重时代感,与新时代音乐形态、演奏乐器等相结合,促进其发展,以体现出它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言的、地域文化的等等信息,所体现的媒介的、科技的、录音技术的变迁等等,所具有的民俗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价值,有待人们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种视角去深挖。

作为人类记忆名录项目,7000小时的音响资料,属于我们的历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历史。它也属于我们的今天,更属于我们的未来。因为,这些传统音乐档案,包含着民族文化大量的基因元素,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血脉,隐藏着破解博大精深流传数千年的中华音乐文化密码,它更是我们未来进行音乐创作时努力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厚地基、激发想象与灵感的无尽源泉。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对这批异常珍贵的音响资料进行数字化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万条音频资料,已经可以让需要它的人们在线上分享。应该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业。它让这些脆弱的音响资料,以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跟上科技飞速发展的步伐,得以有效的保护与保存,并借助互联网获得广泛传播,使其真正成为可供世界人民共享的“世界记忆遗产”。作为该艺术与文献馆的前身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曾经的馆长,我为我的同事们所做的这项工作而深感骄傲。我要对他们表达我的崇高敬意,为他们点赞!

(作者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常务副主任)